

將軍哭陵的事與人

王覺源

毋忘教訓補過盡忠

我政府由大陸播遷來臺之前，在南京曾發生過一次所謂「將軍哭靈」的事。當時大陸人心雖還安定，而一般左派份子，唯恐天下不亂，則乘機推波助浪，加油添醋的大肆渲染宣傳。而一般忠貞愛國與生活於迷信中的人士，對此事則諱莫如深。蓋恐這種倒楣晦氣的事，張揚起來，會影響到士氣民心，有傷國運。世俗何以認為這是倒楣晦氣的事？因為中國過去歷史上，有些亡國喪邦之君，當其準備逃亡，或向敵方投降之際，又戀戀難捨其國土皇位，常有一種「辭陵」、「哭廟」的儀節。像後蜀主孟昶就是一例。這舉動的用意似在：一、自作孽，要把罪由自取的不幸，反歸咎於祖宗。二、急難臨頭，計無所出，還想乞靈於先人枯骨，不管其用意如何，總是一種途窮路末的作法與敗亡的徵兆。於是除有心折臺的左派奸徒之外，多數人則深藏其口，不忍張揚。是故來到臺灣以後的人士，和一切書報雜誌，本着孤臣孽子的心理，仍是諱言其事。不久前，偶然發現中外雜誌第二三八期，莊烈先生所作一

明月嬌娃一片心」文中，有一小段「南京哭陵震撼軍心」的記載：

「原來陳總長，認為抗戰已經勝利了，共產黨不足為患。為了節省軍費開支，乃擬出一套裁軍計畫，縮編部隊，裁撤編餘軍官。因此激出五月將官哭陵事件。百餘被裁將官，悲憤難抑，相約齊上中山陵哭陵。事先特別安排了一個將官遺孀帶頭。所有將官，一律服裝整齊，佩戴階級勳章，魚貫進入中山陵大殿。那遺孀一聲悲號，百餘將官跟着齊聲痛哭起來，場面非常淒慘。蔣主席聞悉大怒，把陳總長叫去訓斥了一頓。」

這是我來臺以後，所僅見關於「哭陵」的文字記錄。所謂「將軍哭陵」，猝聞之，好像是一個莫能甚解，近乎荒唐的命題，且不管這命題之適當與否。民國三十六年五月，南京編餘將領，由「謁陵」一變而為「哭陵」，事實是的確有的。祇是莊文未將其經過詳情，報導出來而已。現在時間雖早已過去了四十年，當年若干重要人物，又所存無幾，已經失去探討的價值和線索，尤其說到晦氣倒楣、哭哭啼啼的事，總不免有點令人寒心。縱有值得同情的地方，故事也實不足以

為訓。今日痛定思痛，其痛猶存。往事重談，不外要提醒大家，毋忘歷史的慘痛教訓，退思補過，更能進思盡忠而已！

戰後整軍事屬必要

一場大戰之後，為復員生產，重建家園，安定社會計，縮編整軍，乃屬必要之舉。不說中國平時養不起如此龐大的軍隊，世界各國，也是如此。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列強曾有「軍縮會議」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中、美、英、蘇四強，也有「裁軍會議」。這兩次會議，雖因列強同床異夢，各懷鬼胎，使會議流於形式；但事實上、心理上的裁軍要求，總是有的。這種不切實的會議裁軍，非徒無益，反滋疑忌，貽患所及，乃使世界軍備競賽，於今愈烈。

就近代我國而言，滿清政府，弭平太平天國革命之後，裁撤湘、淮諸軍。由於統軍將帥的忠誠，自動請釋兵權與公平合理的任事，乃能迅速達成，而未發生較大的事故。辛亥革命，推翻滿清皇朝以後，由於袁世凱的野心用事，不但沒有實行裁兵，反而擴軍自固，致造成以後軍閥割據

中之局，混戰不休，誤國十餘年。國民革命軍，北伐統一全國以後，民國十八年的「編遣會議」，仍以各方利慾之心未泯，致劇未終而人已散。不但產生了擁兵稱霸的馮（玉祥）、閻（錫山）、李（宗仁）聯合反抗中央的危局，尤使中共擁兵叛亂，飛機坐大，釀成後來歷史千古未有的奇禍。民國三十八年春，中共劉伯誠與陳毅，率領共軍，聯合渡江，與內奸官僚、政客、軍人，勾結的壓迫，國民黨逼不得已，祇好倉皇辭廟東遷。這就是我們血的歷史教訓，更是我們必須記取的！

中國「七七」對日抗戰，乃是中華民族，自淝水之戰（紀元三〇八年）以後的第一次外族大患。經過八年的苦鬥、動員及於全國的人財物力、將士之流血捐軀犧牲者，又何止千萬，才換得了日本的無條件投降。勝利之後，本着歷史教訓，作迅速復員的計畫，進行國軍整編，便是大動員之後第一重要的措施。民國三十四、五年，政府本「政治民主化、軍隊國家化」的原則，更希望中共「政治服從民主，軍隊交還國家」。那國軍統編整編，便為必要且刻不容緩之事了。惜主其事者，徒知墨守歷史教訓，而昧於時代環境，一未能洞察共軍擴張的趨勢，斷絕其兵源；二未能一秉公平合理的原則與方法來處理，便給了一般編餘官兵，以「狡兔未死，走狗先烹；飛鳥尚存，良弓先藏」的自悲自責之感。因而影響軍心渙散，鬥志消沉，國家之損失尤甚。相反的，中共則乘機而起，收容國軍編餘及詐騙國軍官兵，以攻擊國軍。收取國軍既成的裝備武器，以還擊國軍。雙方力量的對比，我消彼長，已成了絕

對的趨勢。自毀長城，輕讓中共橫掃中原，竊據中國全大陸，尤為至可痛心的事。關於這點，莊先生文中，亦有一段記述，可作參考：

「至於地方部隊，紀律廢弛，為害民衆，確屬事實。政府為此，乃予裁編遣散。以致許多散兵游勇，流離失所，怨聲載道。共產黨正好乘機加以吸收，分化利用。昔日政府的包袱，一變成爲共產黨的新生力量。除了孔憲榮被迫在南京上吊自殺外，後來王家善亦在營口叛變投共。」

國軍整編前後情形

中國對日抗戰前夕，全國陸軍總數，共有四十九個軍，一百八十二師。一些裸色和地方武力，尙未統計在內。抗戰以後，戰區範圍，逐漸擴大，部隊亦不斷擴充，幾達原有三倍之多。三十四年，我爲配合盟軍反攻。國軍經過整理，去蕪存菁。共裁減兵員約三分之一，由六百萬人，減至四百餘萬人。日本投降，抗戰勝利，政府爲使國家平時軍隊人數，恢復正常，並限制中共之私有軍隊，便以「政治民主化，軍隊國家化」爲目標，整編國軍（包括中共部隊），裁併所謂「遊擊部隊」，排除「聲名狼藉」之徒衆。計畫在一年之內（三十五年三月至三十六年二月）第一步，各軍平均裁減三分之一。九個月來，即至三十五年底，編餘官兵共四十餘萬人。事實上，國軍固已遵令積極整編減縮，而中共則反積極擴張。以致後來，中共軍隊的數目，反大超過國軍的數目。

三十五年底，所有編餘的四十餘萬官兵，軍

官佐之優秀者，改派副職。其餘則分別退伍或轉業。軍屬則予資遣。一部份復員軍官佐，則分送各地軍官總隊，及中央訓練團南京總團，或東北分團受訓。時南京中央訓練總團，由黃杰任主任。東北分團，由胡家驥任主任。南京軍官總隊隊長爲丁德隆。無錫軍官總隊隊長爲柳際明。武漢軍官總隊隊長爲劉嘉樹。南昌軍官總隊隊長爲陳沛。長沙軍官總隊隊長爲蔣伏生。復員軍官佐經過如此所安插者，數量仍極有限。可見無職無業者，仍有很多人存在。至三十六年所應編餘的官兵與復員軍官佐，則尙未計算在內。

自創國力中共坐大

中國軍人，自唐、宋實行募兵制以來，什九都是「職業軍人」。他們不是出自行伍，便是出身各種軍事學校或養成所。一朝投軍吃糧，除了打仗作戰之外，其他均一竅不通，一技莫能。一旦被編遣解散，雖略有遣散退伍金可領，數目則實在少得可憐。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養妻子，日常生活時虞匱乏。於是怨尤叢生，由怨生恨，因恨生怒。蘊之於內，必形諸外。不是嘯聚山林，結爲匪盜，便是浪跡江湖，鋌而走險。大則叛國造反，小則爲害地方。所以歷史上每次大戰之後，仍然禍亂頻仍，治安久不得澄清安定者，即緣於此。

抗戰時代的國軍，尤其是軍官佐，幾乎全是職業性的。當時曾有署名于士茹者，退休後，寫了一篇「職業軍人論」。認爲以職業軍人而言，整軍並非其時。八年未歸家園的軍人，家園仍在

炮火之中，全國到處烽火。這批無家可歸的人，最後的出路，是被中共拉過去，強大了中共武力，是動搖國本之策。」誠是藥石之言。惜良藥苦口，當事者絕不願嚼。所謂職業軍人，是以「當兵吃糧」爲生。中國俗語說：「好鐵不打釘，好崽不當兵。」戰時爲着開發兵源，還特別予以鼓吹：「好鐵要打釘，好崽要當兵」。大家還覺得這是很光榮的事。一旦戰事告終，要他們解甲歸田，毫無一點謀生技能，縱有區區一點退役金，又能維持到幾時？這自然是他們心不甘的。老實忠厚者，任憑編遣，變爲失業，流浪求生。而狡黠激烈者，必倔強不服，亟思作奸搗亂。於是左派份子，乘隙滲透。進行挑撥、離間、煽動、分化陰謀。初則喊出種種口號：「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！」「×家不要毛家要！」「此路走不通，去找毛澤東。」這類毒素口號，在編餘官兵中，在遊擊部隊中，便普遍傳播起來。於是有些急進冒進的份子，便拉着隊伍（特別是遊擊部隊），南走越而北走胡。不投降於新四軍便在華北靠攏八路軍；或在關外歸附於林彪。摘下舊帽徽，換上新符號，作了新朝的爪牙，就反噬其故東舊主。不但使國軍前方士氣降低，抑且動搖我後方民心至鉅。相反的，國家戡亂，中共的軍隊，則愈剿愈多；叛亂地區，則愈戡愈大；終致禍亂泛濫，乃至無法收拾。竊思對日大戰之後，顧念民生疾苦與國家財力，編整軍隊，誠是應該的必要的，但我們實行起來，竟如此不符理想。錯在何處？自然責有攸歸。現在事過境遷，我們也不必再來討論。

不平則鳴無告則哭

國軍一般循規蹈矩的編餘將校，無論平時或戰時，大都是溫良有禮，以服從爲天職的本分軍人。一旦編餘遣散，也是身無一技之長，對未來生活，同樣感到徬徨。有部份人，計無所出，曾集體聯名，具呈最高領袖，要求除正規退役金之外，另外發給一點特別津貼，俾於謀生出路，改行或轉業之資，略有挹注。以情理而言，這要求自非過分。當蒙領袖原情，隨予批准。但這公事發交到參謀本部，參謀本部以其爲數太鉅，無此預算可以支付。公事壓置多時，仍如石沉大海。許多將校聞訊，究以事關個人生活的切身問題，頗爲憤慨不平。議論紛紜，情緒亦趨惶急。

大凡物不得其平則「鳴」。似此情形，這批編餘將領「鳴」又無處可以告訴。「無告」，則唯有繼之以「哭」，以發洩胸中的憂愁積鬱。左傾份子的陰謀策略手段，原是無孔不入，無事不可爲的，爲目的更常不擇手段。對國軍編餘官佐之急進者，有一套法術（如前述）；對溫和份子，則另有一套，完全是因人、地、時、事而異。他們現在見風轉舵，新施煽惑伎倆，則爲鼓動溫和份子和份子，效法蜀漢北地王劉諶之「哭祖廟」，或步武李唐故事：「天下有冤者，許哭太宗昭陵之下。」（蜀志：「國降之日，北地王諶，率其官屬，哭於先主廟，以妻子自焚。」）舊劇中的「哭祖廟」，即此悲劇。集體至中山陵下，實行一哭。縱不能如願以償，亦可一洩心中的哀怨。少數編餘將領，受了左傾份子的煽惑，雖躍躍欲試

初猶畏首畏尾，不敢輕舉妄動。終於計及後果。這不特爲親者痛，尤爲仇者快，將自陷於左傾之徒的圈套。編餘軍官佐，當時不被左傾份子所利用，自是明智的。不過未爆的炸彈，危險性總是存在的。

國土重光陵園無恙

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陵園，在南京中山門外紫金山之陽。岡巒前列，嶂嶺後峙。左鄰爲明孝陵（明太祖朱元璋）。右毗靈谷寺與譚墓（故行政院長譚延闓墓）。陵園佔地八萬餘平方公里，林木面積，居五分之四。氣象萬千，建築雄偉。陵墓坐北朝南，逐漸升高。墓地作警鐘形，頂如覆釜，直徑四十餘尺，居園之中。莊嚴肅穆，相當壯觀。陵園內佳木蔥蘢，花草修整。墓室外部，以香港特產的白石鋪面，共分兩層。室內圓頂，作穹窿形，上飾磁製黨徽於中央。墓地中央爲大理石壙，圍以石欄，壙之中央，爲長方形墓穴，即靈柩奉安之所。墓室門分兩重，上刻「孫中山先生之墓」。門則雙扉，以黑色大理石，刻國父手書「浩氣長存」爲橫楣。

祭堂長、寬、高皆約八、九十尺，外面全以香港石製成。廊廡堂有三拱形門，亦香港石的。上刻花紋，門楣分別刻民族、民權、民生陽文篆字。堂之四隅，各建一室，分藏陳列紀念物品。祭堂正面，直嵌刻國父手書「天地正氣」四字。兩壁分別刻國父手書「建國大綱」全文及孫夫人跋文。後壁中央，刻有國父「校訓」、「總理遺囑」、「告誡黨員演講詞」。祭堂外，有大坪臺，兩

端建立卒表。下坪臺，有石階分十段，各段均有小坪臺。石階數十級，均以金山花岡石築成。碑亭立石碑，上勒「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於此」。再下爲陵門，中鑄「天下爲公」四字爲門額。循陵門甬道而上下，道極長且濶，分闢三徑，栽植樹木花草。南端有三大石牌樓。中門橫楣，刻國父手書「博愛」二字。再下爲大廣場，停息車馬。

國父奉安後八年有半，日軍攻陷南京。經過了我八年抗戰時間，國土重光「江山文藻今猶昔，城廓人民是似非」，所幸總理在天有靈，陵園則完整無恙。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，蔣主席介公，勝利凱旋，由平飛京。次日，即率文武百官，謁陵致祭。南京各機關、學校、團體，藉謁陵而遊覽陵園景色者，星期假日常爲途塞。由重慶還都的人士，與國父陵園，至少也隔別了八年。自然更要來謁陵，以表達懷國父之誠，皆視爲很重要的事。三十六年五月，南京軍官總隊同學之組隊前來謁陵者，原意亦在此。事極平常，實不足異。

謁陵一變而爲哭陵

南京軍官總隊的學員，皆係領袖蔣公的門生，亦忠實幹部。信仰純正，思想堅定。雖有潛伏的左傾份子，乘虛蹈隙，從中挑撥，散播謠言，亦未能使他們移其心變其志。或有極少數的官佐，觀念稍異。以平日捨身報國，出入槍林彈雨之中，一旦遭遇編遣，實際生活，自然有些問題。情緒欠佳，亦屬意中之事，然此都與他們虔誠的

欣然的謁陵，實在毫無直接關聯。

三十六年五月，他們那次的集體謁陵。據說是由黃埔軍校出身的黃鶴與奚澤兩位少將所領導。除軍官總隊學員以外，還摻雜一些其他編餘的軍官佐（自動來的），共約三百餘人。興高采烈，浩浩蕩蕩，向中山陵園進發。且組織了糾察隊，沿途照顧。魚貫而進，秩序井然。達到紫金山頂國父陵墓前，列隊向國父遺體行三鞠躬禮後，隊伍暫時解散，自由參觀活動。情形若此，實在沒有「哭」的動機與形象。

如何由「謁陵」一變而爲「哭陵」？而哭陵的起因，也不過是「偶然的巧合」。據說適有一位陳副師長（少將級，忘其名，亦黃埔學生）的夫人，因其夫病歿於逆旅，身後蕭條，無資歸葬。曾向國防部請求救助，久未獲得具體答覆。進無方，退不得。是日，陳妻聞訊，亦率孤兒苦女，起來陵園，擬向其夫的老同學訴苦，冀能稍獲資助。她邊說邊哭，聲淚俱下。當時一些在場的編餘軍官佐，深表同情不免羣情激動。加以奚澤少將，起而爲死者訴說身世及病歿經過。慷慨陳詞，又因激動過度，當場暈倒在陵前。復有一將官，對總理之陵哭訴說：「我們是黃埔第一期學生（當然不盡是），追隨總理及校長東征北伐的職業軍人。如今退役了，又無家園可歸。一生戎馬下場，將何以終老？」痛哭流涕很久。這種景象，印入羣衆眼裡，多不自覺的拋下同情的淚。事態因而擴大，謁陵亦變了形象。時南京市各報記者，已聞軍官隊來謁陵，即隨隊而來採訪。黃鶴少將又一面哭，一面招待記者。大發牢

騷說：「革命抗戰的勝利，是黃埔同學流血犧牲的成果。現在江山初定，便出現了鳥盡弓藏的情勢。」以博新聞界的同情。當時現場記者約五六人，除分途採訪外，並將陵前實況，與陳副師長夫人拍了一些照片。由於新聞界與好事者，捕風捉影，繪色繪聲的傳播，事便無法掩飾，於是新聞也變質升級了，由「謁陵」、「哭陵」而成爲「將軍哭陵」了。左派份子預謀設計的炸彈，也終於爆發了。

平心論事，此次編餘軍官由「謁陵」一變而爲「哭陵」，實出於當日參加者意料之外。其所以致此者，乃由於臨場沒有明智的處事人。陳副師長遺眷之蒞陵園，原不過是藉機求助於其夫的老同學而已。爲其同學者，祇須溫言慰之，並爲「發起集購」，負責向有關機關交涉，這一肇事之起因（陳妻哭訴）即可化解於無形，不致再有波浪。次則，奚澤少將，如能理智的立詞與處事，又何至於「激動過度」，刺激了羣衆，也不會讓事態擴大。黃鶴少將，更不該以哭泣姿態，招待記者，說出未經「理智考慮，純粹感情用事」的話。使真相被掩，則幾近煽動。亦事態擴大之重要原因。加以新聞記者的採訪報導，與一般好事者的義務傳播，通常多有一種「無不如有，有不如奇」的心理，乘風揚波，肆其鑿鼓，其能驚世駭俗，愈大愈廣者更好，這才能引人入勝。說句喪氣的話：這正是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」

領袖關懷情緒平息

無中生有，「將軍哭陵」之事，無法密封。

中外雜誌

終上關於國民政府的蔣主席。蔣公頗為震怒！立即宣召負責人員查詢。南京中央訓練總團主任自不免於一次訓斥。不過深入一層究之，某主任似是代人受過。心有隱衷，又有口難宣。關於這一點，據說：「某主任平日對將官班同學講話，遇有難言的關鍵，常忍不住有淚盈眶。」即此可以看得出來。

將官班，雖係軍事性的組織與生活，但非常民主。時恐學員意見，不便反映，因特置有「意見箱」，鼓勵同學多貢獻其寶貴意見，以供採納改進。但負責人檢閱意見條時，多係匿名的。所提意見，大多是指責某某等幾人。直言：「不怕編，祇怕騙。」其中的蛛絲馬跡，又似與此次整編軍隊有關。「編」的事實，是有目共見的，但「騙」從何來？自非局外人所能洞悉的。或有欠公平合理。或導因於過去一般大官顯要，談話講演不經腦筋考慮，「大言不慚」、「開發空頭支票」，以取快一時。到後來，「言行不符」，又藉故來「搪塞」，也自然難逃「騙局」之譏。總之，事已過去，是非公道自在人心，亦不必再說了。

不過此風傳一時的「將軍哭陵」事件，祇算是芝麻豆子大的事，算不了什麼。後來經過當時國防部長白崇禧氏，親臨解釋，安慰大家一番，並勸大家以國事前途為重之後，羣衆情緒，便自然的平息下來了。

最後補充一點，三十六年五月，所謂將軍哭陵事件中的兩個風頭人物，一為黃鶴，湖南湘陰人，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。能言善道，原是一個

最好的宣傳人材。曾於軍事委員會政訓處時代，隨賀衷寒處長，從事政治工作。抗戰之初，曾任陳明仁預備第二師的上校後晉少將。三十八年，陳明仁在長沙率王勁修、傅正模、李覺等部「陣前起義」，投降中共時，黃鶴本人，則早已離開了陳明仁。他由南京軍官團結業後，返回湖南，棲遲長沙甚久，依然落魄失意。某日晨，他在長沙南門外天心閣茶樓飲茶，被中共數名解放軍，邀去談話，從此真是「黃鶴一去不復返」。不久聞以「國特」之罪，被槍決於長沙瀏陽門外。一為奚澤少將，廣東人。其人短小精悍，善說詞，相當風趣，也相當活躍。嘴上留着日本仁丹式的鬍鬚，同事多以「奚鬍子」稱之，亦黃埔軍校早期學生。原在錢大鈞、陳繼誠、李玉堂等部隊中，服務甚久。抗戰之初，與黃鶴少將，同在陳明仁部任職，擔任副官處上校處長。三十四年，升任李玉堂二十七軍團總部少將副官處長。編餘受訓以後，動向未悉。有人疑其已隨陳明仁向敵靠

攬；有人則謂回廣東家鄉隱藏起來了，消息不明，似已失蹤。三十六年，「將軍哭陵」的事，新聞傳播的消息，亦略有不同。無論誰居領導，黃鶴少將與奚澤少將，總是在場的人物。就時代而言，這時乃一個悲劇開始的時代。日本雖已投降，中共則正圖雄霸中原。就實際言，抗戰時的將領，非解甲之時，而強使之解甲；士卒不是放歸田里之時，而竟放歸田里。自己授人以柄，為淵驅魚，作了我棄人取，自暴自棄的事，選能怪誰！黃、奚之輩，正是處在這個悲劇時代的將領，不能善處其變，欲不造成悲劇下場者，很難！

民主時代，自然不能像：「孤援說齊王。齊王不受。孤援出而哭國三日。齊王問吏曰：哭國之法若何？吏曰：斬」。當年黃鶴與奚澤，雖未遭到處「斬」之刑，也未「哭」出什麼名堂來。結果大局敗壞，敵人來了，仍是一個死於非命；一個失了踪。較之哭陵時的情況悲慘萬分，天壤之別。

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

定價台幣18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評述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